

中国高级记者丛书

报海遨游

— 谢烽新闻作品选



新华出版社

中国高级记者丛书

报海遨游

——谢烽新闻作品选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报海遨游：谢烽新闻作品选/谢烽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12

(中国高级记者丛书)

ISBN 7—5011—4635—7

I. 报… II. 谢…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122 号

中国高级记者丛书

报海遨游

——谢烽新闻作品选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瑞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插页 2 张 200,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4635—7/G · 1715 定价：18.00 元



谢烽，1931年出生，广东潮安人，越南归国华侨。1952年从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调到中国新闻社当编辑。1953年调到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当记者。195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调到新华社国内部当编辑。1969年调到山西日报社当编辑和记者。1976年调到广州日报社，曾任副总编辑、代总编辑等职务。1988年被评为高级编辑。1991年退出报社领导岗位后，曾先后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常务理事和广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常务副主席等社会职务。

谢烽从事新闻工作46年来，编辑和撰写了大量消息、通讯、评论、杂文、散文和新闻业务文章。任副总编辑和代总编辑期间，积极参与《广州日报》的新闻改革。1992年5月，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谢烽同志广州市优秀专家、学者称号，同年10月1日，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序

李 庄

《报海遨游》出版之前，我有幸读了书稿，受到了许多启发，也产生了不少联想。书中谈到的一些问题，是我苦思已久现在继续探索的。在许多问题上，我同作者有共同的思路和语言。

谢烽同志是我的好朋友，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党的新闻事业。他在新闻工作中是出色的指挥官，又是忠诚的战斗员，做了一个指挥员该做的事情，又写了大量新闻、通讯、调查报告、评论、杂文、散文和研究新闻业务的文章，称得上新闻工作中的“多面手”。退到二线以后，肩负《广州日报》交付的使命，或受社会团体的委托，到二十多个省（区；市）工作，随机采访，继续写作。我总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一息尚存，又能思考，是不应该停笔的。他做得好。

我幼年在河北一个小县城生活十几年。旧中国诸事落后，工业更落后。这个小县城售卖日用品的店铺，都标榜出售“地道”的“洋广杂货”。舶来品——“洋”，自然是一等；其次就是“广”。新中国建立以后，广东许多方面继续走在前头。《报海遨游》中一篇文章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广东省，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之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势头之猛，人民生活改善之显著，举世瞩目。加上政局稳定，民主与法制逐步走向健全，为广东省传播媒介的创新、开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经济环境。”传播媒介属于上层建筑，有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加上新闻从业者操作得力，广州的新闻改革走在前列，是容易理解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它们的新闻传媒都经过先行

·滞后——发展的曲折过程，当然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新闻工作，1921年正式成立，1922年就创办中央机关报《向导》，毛泽东曾任主编。《向导》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公开或秘密出版，奋斗5年，被迫停刊。在苏区和长征期间，尽管有左倾路线干扰，仍然出版不少报刊，终因战斗激烈，流动性强，时断时续。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敌后军民建立了多处相当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革命新闻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共产党大力抓枪杆子和笔杆子。笔杆子，首先是叫作党报的这个笔杆子。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当时党的路线正确，上下同心，全力对敌。军民生活十分艰苦，精神非常舒畅。群众负担虽然相当重，大家自愿输将，毫无怨言。干部工作在前，生活在后，目前存在的许多恼人的社会问题，当时都未发生。中央的号召，报纸的言论，完全符合大家的心意。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存在，但轻到人们几乎感觉不到。

抗日根据地艰难的物质生活和激烈的对敌斗争对新闻工作的影响，至今还难说没有痕迹。谁都承认“快”对当代新闻工作是多么重要，但许多新闻工作者，我是其中之一，却长期不加重视。根据地缺少现代通讯工具，交通十分困难，使人自然得出结论：快不起来。更重要的是诸事要先考虑对敌斗争的需要。打了胜仗，有时要马上报道，有时要等时机成熟再报道，有的根本就不报道。有一次（1942年）我们打了一个胜仗，本来应该等等再说，我却“及时”报道（事实完全准确无误），受到刘伯承同志的批评，说我“年纪轻不懂政治”。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的错误犯过不止一次。

新闻界的整风，被我们认为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我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整风，比延安稍晚。领导接受了延安整风的经验教训，（我们整风班）主要解决人生观、世界观问题。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溶化到血液中”了。四个“服从”的思想雷打不动，几十年避免许多错误靠它，发生不少迷惘也源于它。我认为要把党的建设成为一部有强大战斗力的机器、一

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没有四个“服从”是不行的。但四个“服从”是一个整体，互相补充，互相制约，割裂开来必然出事。“反冒进”、“大跃进”都有教训，更不要谈“文革”十年了。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拿不准。这是一个很难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报海遨游》不是专门探讨上述问题的书，但我发现书中不少观点，从新闻工作角度实际上解决了上述问题的若干部分。这些观点是：

党报欢迎不同意见的讨论；

除了把报纸办得省、市委满意之外（指中共省、市委机关报），还办得广大人民满意；

加强党报的指导性，在做好中心工作报道的同时，增强报纸的可读性；

探索报纸文章的定论与讨论的关系，探索定论如何宣传得好，讨论如何开展；

加强宣传的指导性，使“上情下达”；加强舆论监督，使“下情上达”；

视野要扩大，报道面要宽，信息量要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很快，尽力增加信息量；

力争做到（新闻、评论）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慢我快，人粗我精；

不限定广告面占报纸全部版面的百分之几，而限定新闻、文 意不少于多少个版。

我们国家正在“改革、开放”，新闻传媒当然不能例外。上面几条是阅读《报海遨游》时摘记的。第一很难说完备，第二很难说准确，第三更不认为都适用于全国各地，但我认为，这种探索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在《广州日报》已经显示了作用。相信类似的探索会在全国推广开来。

注：李庄同志系《人民日报》原总编辑。

目 录

序 李 庄

第一部分 往事回首

“安全着陆”	(3)
难忘的海运仓	(4)
一次险象丛生的采访	(6)
一期“号外”	(11)
我的青春小鸟去了又回来	(13)

第二部分 新闻改革

缩短距离 贴近受众

——谈广东省新闻改革的新突破	(19)
广东省新闻改革迈出新的一步	(23)
先行一步的广东报业	

——在广东省新闻学会’96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7)
《广州日报》的新闻改革.....	(33)
力争把《广州日报》办得两头都满意	(39)
广州日报社的突破	(42)
从何着手?	

——对创办国际大都市报纸的思考	(51)
创办广系报刍议	(62)
报市话争	(68)

八个“重”字

- 在中南六省三市记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76)
大中小“桥”连五洲 (81)

第三部分 神州采风

- 芦沟桥上崎岖路 (87)
中秋佳节在内蒙古 (89)
沉浮的高原
——内蒙古鄂尔多斯见闻 (91)
既平静，又不平静
——中苏界河黑龙江见闻 (93)
冰天雪地也是优势 (95)
迎着西伯利亚的寒流 (97)
大寨行 (99)
大庆行 (106)
大连行 (113)
青海湖观鸟 (119)
溪口见闻 (123)
环金门岛地区见闻 (125)
鬼城里的笑声 (134)
夜郎志大 (136)
走马娄山关 (138)
珠江探源 (140)
神农坛上炎帝魂 (142)
没有市长的城市——宜昌 (147)
武昌鱼的故乡 (149)
另一个通用粤语的“省城” (151)
快乐的广州人 (153)
西街奇观 (154)

白楼内外足球缘

- 已故球王李惠堂故里见闻 (159)
- 九龙城寨的变迁 (165)
- 澳门杂记 (167)
- 在“四海”分界处 (173)

第四部分 环球揽胜

八千里路云和日

- 从北京到法兰克福 (179)

万三里路星和月

- 从广州到法兰克福 (181)

飞越阿拉斯加 (183)

辫子·牙齿·鸽子 (185)

痴情一片系神州

- 美籍华人书法家陈煜均印象记 (187)

从旧金山到新金山 (189)

新加坡：异域似故乡 (194)

婆罗洲见闻 (198)

神奇的“三宝公鱼” (203)

旅游车里的“傻大姐” (205)

走访“洋衙门”

- 奥地利首脑机关见闻 (207)

吃“洋派饭” (211)

407岁的中学 (213)

走马莫斯科 (214)

法兰克福访问记 (216)

“凯旋门”旁柏林墙 (221)

里昂访问记 (223)

罕见的检查

—从北京到特拉维夫.....	(228)
耶路撒冷访问记.....	(230)
平静的戈兰高地.....	(235)
友好的以色列人.....	(236)
沙漠流出奶和蜜.....	(238)
死海献出金和银.....	(240)
废墟成为圣地.....	(242)

第五部分 境外传媒

新加坡华文报人：同行加乡亲.....	(247)
同维也纳新闻界朋友在一起.....	(250)
苏联劳动报总编辑一席谈.....	(252)
纽约的两家中文报社.....	(254)
印度尼西亚只有半份华文报纸.....	(258)
法兰克福：“衙门”穷，传媒富	(260)
里昂新闻界随时准备打官司.....	(263)
以色列新闻界的新闻.....	(265)
洲际化多元化的星岛报业集团.....	(270)
澳门：弹丸之地传媒多.....	(274)
澳门日报社高效率的“秘诀”	(276)
后记.....	(280)

—

往事回首

“安全着陆”

刚才，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钟宜佳同志、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凌炯昌同志先后传达了市委关于广州日报社总编辑人选变动的决定。对此，我表示坚决的拥护。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黎元江同志兼任广州日报社总编辑表示热烈的欢迎。

钟部长和凌部长在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我退出广州日报社领导岗位的惟一原因是超过 60 岁，并对我主持广州日报工作期间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到广州日报社工作已满 15 年。其中有 7 年又 4 个月任中层下部，5 年又 7 个月在编委会任副职。2 年又 2 个月主持报社的工作。在报社这个敏感的单位任第一把手，要平平安安地下来很不容易。就像飞机在空中飞行那样，人们难免为它能否安全着陆而操心。广州日报社前几任第一把手，有的不愉快地离开了广州，而黄永湛同志则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我主持报社工作的 2 年又 2 个月，尽管累出了病，住过两次医院，但总算无大碍；尽管在报纸上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没有犯过大错误。今天，我在身体比较健康、思想非常愉快的情况下离开领导岗位，真可以说是实现“安全着陆”。我为此感到庆幸。这是与市委的正确领导，报社编委会和全体员工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及时提醒分不开的。借今天这次会议，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主持工作的这两年多，想改进工作、理顺一些关系、解决一些问题。其中，有的已动手解决并有点效果。但由于自己的不足和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虽动手而效果并不明显，有的则尚未动手。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希望得到同志们的谅解。

我相信以黎元江同志为总编辑的编委会，一定会更加团结，更好地协作，思想更加解放，解决过去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或解决得不够好问题，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比我主持工作时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相信报社全体员工，特别是中层干部，能够更大力地支持编委会的工作，使广州日报社的采编、经营、管理等工作和政治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广州日报社的所在地“西瓜园”有过光荣的革命传统。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西瓜园”里一定会结出更多、更大、更甜的“西瓜”。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这是 1991 年 8 月 10 日本文作者在广州日报社部主任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难忘的海运仓

海运仓，座落在北京东直门内，虽然有个“海”字，却既不靠海，又不近江河，南、西、北三面都是胡同。但是，说它是“海”，又有点道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个专业，在这里汇成了知识的海洋。刚到北京不久，海运仓就成为我向往的地方。

1951 年早春，我在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当科员。每天在法定的九个钟头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当时刚满二十岁的我，精力十分充沛，求知欲望格外强烈。经过多次请求，领导被感动，终于同意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夜大学的走读生。我第一次踏进海运仓，在灯光下听老师讲政治经济学，开展“习明纳尔”（俄语，指

课堂讨论）活动，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有趣，不论刮风下雨都坚持上学。不到一个月，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们机关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不是开会，便是学习。我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海运仓。

尽管学习时间很短，海运仓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北京，在福建，我不止一次地要求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正式学生。特别是 1955 年新闻系第一次招生时，我的要求更加迫切。但是，每次得到的回答不是“工作离不开”，就是“要服从分配”。一转眼好几年，这个愿望都没有实现。

五年后的仲春时节，我从福州到北京参加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在怀仁堂，周总理畅谈国内外形势之后，动员在职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顶头上司就坐在我的旁边。我在沪、浙一带完成工作任务后回到福州，立即提出报考人民大学的要求，终于得到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和总社主管领导的批准。经过半个多月的突击复习，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多年的梦想实现了！1956 年秋季，我的户口转到了海运仓。

我所在的四班的 20 名同学，原来都是从事新闻工作，有的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中央报纸，有的来自省报和地区报纸，有的还担任领导职务。尽管彼此职务、级别不同，但到了海运仓，大家都是同学，等级观念一扫而空。在学习上，互相切磋，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学习之余，有说有笑，有时还打打闹闹，仿佛回到孩提时期。绝大多数同学都争分夺秒地学习，特别是晚饭后，阅览室门口围满了人，门一开，大家就涌了进去……

可惜，好景不常，1957 年夏天，继大鸣大放之后，反右运动开始了。人民大学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层层对运动抓得很紧。可是，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许多人走进闹哄哄的会场参加辩论或听别人辩论，我却到冷清清的阅览室或课室看书。受到党支部委员批评后，我改变了策略，开大会期间，人们在台上批判，我在台下看政治书籍；不开会的时间，抓紧学习中国文学、英文和逻

辑、修辞。不久以后，在批判“白专道路”时，我受到了批评。

几年记者生涯，使我养成爱动笔的习惯。到海运仓后，老是想写点东西。看到新华社有些稿子写得很好或不那么好，我便给《新闻业务（活页版）》投稿；到北京郊区农村生活和到内蒙旅游之后，我写了一篇又一篇通讯。这些作品被采用后，登上我的名字或笔名，给我邮来了稿费。这又给我带来麻烦：党支部开会的时候，有人批评我追求个人名利，有人说我“摸鱼捞虾”赚外快，在一篇新闻的小样里，我成为一个典型例子……

在学校坚持读书受批评，抽空写作遭指责。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但在当年这却是事实。

1958年春天，新闻系搬到铁狮子胡同，我又一次离开了海运仓。我在海运仓这个知识海洋里虽然只住了一年半，却获得了不少“宝藏”。对我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北京、四川、山西、广东等地落户。只要到首都，我总要抽点时间回海运仓，或到被改为北京中医学院的校园里徜徉，或在灰色的围墙外边漫步，寻觅流水般逝去的时光留下的痕迹……

（1989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广州地区校友会刊》第三期）

一次险象丛生的采访

1955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新华社福建分社的领导打长途电话到泉州，叫我放下其他工作，尽快到原来属金门县的大嶝岛和小嶝岛，采访民兵对敌斗争的事迹，重点是采访民兵队长洪顺利。还说，稿子准备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召开期间发